

中国共产党
军队政治工作

七十年史 第六卷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损害
在改革开放中创造新局面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
军队政治工作

七十年史 第六卷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损害 在改革开放中创造新局面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解放军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7 号

书 名：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六卷）

著 者：姜思毅 主编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印刷者：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

发行者：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125

字 数：208 千字

版 次：199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199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书 号：ISBN 7-5065-2556-9/D·295

定 价：11.00 元（平）

编者献辞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开始从事革命的军队政治工作。

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

政治工作出战斗力。政治、思想本身是战斗力的重大因素之一，是精神战斗力。战斗力的其它因素，如武器装备等等，离开人的因素，离开人的精神因素和技能因素，离开政治工作的保证，也成不了战斗力。

党的政治工作，从来是我军的看家本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

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原则、方针方法、制度和作风，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精髓。

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这个优良传统，是我们的党宝、国宝、军宝。

本书通过 70 年的历史体现我党我军的这一优良传统，总结各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概括党的政治工作的丰富理论，阐述毛泽东政治工作思想，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服务，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为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服务。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和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恩格斯语，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 政治工作必须在继承和发扬历史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不断地改革创新。研究历史、学习历史本来就是为了改革现实, 争取更美好的未来。

党在军队的政治工作70年史, 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工作学教科书。

改革呼唤着政治工作必须加强和改进。改革也呼唤着政治工作理论指导和理论研究的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工作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是改革的先导。任何改革都是伴随着对历史的反思而进行的。

本书的第一卷, 着重叙述我军政治工作在北伐战争中萌芽,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奠基。

本书第二卷, 叙述八路军、新四军在八年抗战的人民战争中, 政治工作保障了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政治工作理论本身, 在抗日战争中达到成熟。

本书第三卷, 叙述在解放战争的各个阶段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声有色的政治工作的伟大创造和丰富发展。

本书第四卷, 叙述抗美援朝战争提供的现代化作战条件下人民战争政治工作的宝贵经验。叙述新中国建立初期为消灭残敌, 和为开始现代化革命军队建设进行准备中政治工作的方方面面。

本书第五卷, 叙述在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道路上政治工作的曲折前进。

本书第六卷，叙述“文化大革命”的10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10年中的我军政治工作及其经验教训。

全书开头，有一个绪论，阐述马克思主义为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全书末尾，有一个结束语，论证进一步健全政治工作学的科学体系问题。

这部《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分印六卷，六个编者，披阅六载。我们的工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做到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并努力进行理论的阐述和概括。这部书如果能够对读者有所帮助，如果能够在发展政治工作学的进程中做一点贡献，这对于我们六年的劳动，就是莫大的欣慰。

这部政治工作史，还从一个重要侧面，涉及中国共产党70年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战史，毛泽东思想研究，党的建设研究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研究。我们仅以这部书作为向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一份献礼！

我们期待着读者对本书的批评，以便改正缺点和错误。

姜思毅

1991年4月15日

主 编: 姜 思 毅
副 主 编: 孙 庆 云
本卷撰稿人: 张 天 荣
滕 玉
姜 思 毅

目 录

第 六 卷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损害 在改革开放中创造新局面

(1965年11月—1987年9月)

第一章 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5年11月—1976年10月) (1)

第一节 在“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中 (2)

第二节 在全面内战天下大乱中 (4)

第三节 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和“四人帮”
被粉碎中 (6)

第二章 政治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损害

(1965年11月—1976年10月) (13)

第一节 学习毛泽东著作被引入歧途 (13)

第二节 “三支两军” (17)

第三节 “批陈整风”和“批林批孔” (21)

第四节 “军队要整顿” (27)

第五节 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32)

第三章 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

方针政策，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1982年8月) (39)

第一节 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40)

第二节 着重纠正“左”的倾向，同时批判右的倾

	向，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 的贯彻执行	(51)
第三节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	(81)
第四节	开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	(89)
第五节	保证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	(100)
第四章	在改革开放中开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1982年9月—1987年9月)	(132)
第一节	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大”和有关会议精神， 进一步端正政治工作指导思想	(133)
第二节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进行“得失观” 的大讨论	(149)
第三节	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整党	(161)
第四节	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	(172)
第五节	开展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培养军地两用 人才活动	(177)
第六节	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	(187)
第七节	保证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和 裁军一百万	(199)
第八节	颁发《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 工作的决定》	(209)

论政治工作十大关系

——《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 结束语	(221)
----------------------------------	-------

第 六 卷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损害 在改革开放中创造新局面

(1965年11月—1987年9月)

第 一 章

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5年11月—1976年10月)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我们的党、国家、军队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以保证全军贯彻执行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的我

军政治工作，在这十年中，不可避免地贯彻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错误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从而使军队各方面的建设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政治工作本身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同时，由于我军政治工作几十年来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在广大指战员中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由于在全国大动乱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在警觉地维护着我国的安全，保持着军队的统一和基本的稳定，使它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正常的工作。由于党内、军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指战员一直在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所有这些都使军队政治工作在这十年中，既有严重的错误和损失，又有一定的成绩，经验教训是很多的。

本章简要叙述一下“文化大革命”中与部队直接有关的若干重大事件和情况。

第一节 在“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中

(1965年11月—1966年4月)

1965年11月，江青、张春桥合谋，由姚文元执笔写了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4月2日，戚本禹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两篇文章，吹捧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这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像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池潭，平静的水面沸腾了起来”。批评吴晗的文章《海瑞骂皇帝》“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擂鼓助威”；《海

瑞罢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

在江青制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同时，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对罗瑞卿进行了所谓揭发批判。罗瑞卿被硬加上“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罪名，说他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在批判《海瑞罢官》之后，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他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请出解放军的“尊神”，对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展开更有力的进攻。总政治部派人参加了座谈会。1966年2月，产生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制造了“文艺黑线专政论”。

1966年4月8日到6月11日，林彪、江青指令召开的全军创作会议，按《纪要》的口径对号定罪，对数十部影片加上了“大毒草”、“坏戏”等各种罪名进行批判。会议诬称由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罗瑞卿等代表人物专了军队文化部门的政，并诬陷总政治部一些部门负责人是军队里“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对许多部队文艺工作者戴以“反《纪要》”、“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进行批判打击。贯彻和推行《纪要》的结果，整个文艺园地陷入一片死寂。《纪要》成为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舆论准备。

《纪要》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推动下，很快从文艺战线扩展为教育、出版、体育、卫生、公安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以至全党全军的“黑线专政论”。由此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和十年内乱。

邓小平在1985年讲：“‘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1965年就开始了，1966年正式宣布”^①。

第二节 在全面内战天下大乱中

(1966年5月—1969年4月)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通知》（即《5·16通知》）。通知提出：要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5.16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始。

总政治部于5月下旬、6月中旬，先后对全军如何贯彻执行中央《5.16通知》，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了要求；并规定，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大鸣、大

^① 引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5页）。

放、大字报、大辩论”（以下简称“四大”）。部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声讨大会。但是，从1966年下半年以来，运动步步升级，秩序日益混乱。对此毫无思想准备的干部战士，普遍担心搞乱社会秩序，影响生产；担心打击面宽了，把敌我矛盾扩大化；担心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也有许多同志担心“破四旧”破了优秀文化遗产。还有些官兵因亲属被批判斗争，而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不满情绪。此外，也有人对师以下部队只搞正面教育不理解，认为“地方上搞得轰轰烈烈，部队里搞得冷冷清清”。一些学员要求开展“四大”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的学校也成立了群众组织，形成了造反派，因而有些系统也对自己的院校派了工作组。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军委领导和总政治部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尽量缩小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院校的范围，撤销了军事院校工作组；要求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在必要的时候，上级还可以派人到学校去。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插话中，再次提出派工作组百分之九十犯了方向性的错误。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所谓“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时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重点整党内的“走资派”。向“走资派”夺权，要求“敢”字当头，放

手发动群众，运用“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10月5日，军委、总政发出指示，宣布取消“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此后，除军以下野战部队外，“文化大革命”就在军队中开展起来，造成了混乱。

军队的“路线斗争教育”随着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展开。教育的基本形式就是开展所谓大批判，在批判中学习、理解“毛主席革命路线”。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德怀、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与此同时，在林彪指令下，开始了“砸烂总政阎王殿”的行动。林彪、江青一伙，在总政治部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有一大批干部受专案审查，有些人被迫害致死，许许多多的机关干部和直属队干部被赶出总政。总政治部确实被“砸烂”了。全军的政治工作更加受影响受损失了。^①

第三节 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 和“四人帮”被粉碎中

(1969年4月—1976年10月)

① 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书》除了列出他们对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瑞卿等人的诬陷、迫害罪行以外，还有如下判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批干部，企图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受他们的控制。1967年7月25日，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诬陷迫害了大批干部”。

“文革”中形成了两个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大体说来，在“九大”以前，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是以互相勾结为主，勾结中又有矛盾；在“九大”以后，两个集团因争权夺利而产生的矛盾上升，矛盾中又有勾结。两个集团间争权夺利，又都是为了向党和人民夺取最高的权力。

林彪在历史上为党和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的政治野心随着他的职务的提升、权力的增大而逐步发展，终于走上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道路。“文化大革命”为林彪施行反革命阴谋、组织反革命集团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集团则阴谋乘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之机，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他的策略是假意推举毛泽东任国家主席。4月11日，林彪提出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12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5月中旬，林彪对吴法宪说，他仍然主张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林彪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7月，叶群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7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而叶群于8月初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8月中旬，叶群要陈伯达和黄永胜准备关于称天才的语录。21日，叶群在庐山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林彪、陈伯达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说：谁要当国家主席，谁就加上。在开幕式上，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议程：（一）

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这时，林彪突然在会上发表讲话，是别有用心的。林彪喋喋不休地申明“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并且影射攻击同意不设国家主席的人。叶群秘密嘱咐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要按照林彪讲话的调子在各组发言，并且串连一些部队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发言。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另一方面，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吴法宪和张春桥在小组会上唇枪舌剑，就反映了两个集团之间“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和斗争。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11月16日，党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全党全军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空司办公室原副处长）、李伟信（空四军政治部原副处长）在上海秘密据点密谋。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法西斯专政。

8月中旬，毛泽东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

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巡视南方极为疑忌。在谋害毛泽东的阴谋失败后，9月13日零时左右，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乘车从北戴河逃往山海关机场。在256号飞机强行起飞后，雷达发现256号飞机向蒙古方向飞行，周恩来请示要不要拦截。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们去吧。14日下午，周恩来得到外交部转来我驻蒙使馆的报告：9月13日凌晨2时多，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乘员九人，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叛党叛国，自取灭亡。